



首页 留言板 新闻 文档 我要投稿

用户名:  密码:  [记住我](#) [登录](#) [注册](#)

当前位置: 文档 » 文档明细查看 » 论著资料 » 学术论文

## [明清]明人张楷与日本宝德三年遣明使

江静

来源: 中日文化交流集刊

投稿人: 董科

发布时间: 2008-7-13

阅读次数: 460

明代的中日关系,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朝贡贸易和倭寇肆虐,至少在明代前期,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开展得甚是活跃,而要充分认识此问题,离不开对民间交流个案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对张楷家族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即是其中一例。

张楷,一个在今天并不十分受重视的人物,在明代却颇有名声,其家族,在宁波也曾显赫。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张楷一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谱写的段段佳话。对此,日本学界曾有人撰文予以介绍[1],中国学者也曾提及张楷子嗣与日本文人的往来[2]。然而,上述研究皆非专以张楷为考察对象,对相关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因此就欠充分和透彻。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张楷一家与宝德三年遣明使的关系。至于其家族后来与日本人的文化交流活动,因篇幅所限,拟日后再作讨论。

### 一、张楷生涯及著述

张楷(1398—1460),浙江慈溪人,字式之,号守黑子。虽《明史》不载其传,然包括《明实录》在内的明清史料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记载,其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张楷生平的史料主要有四则:杨守陈(1425—1489)《南京右金都御史张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3]、吕原(1418—1462)《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4]、李贤(1408—1466)《中宪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铭》)[5]、《宁波府志》卷二十八《张楷传》[6]。其中,吕原的《墓志铭》和李贤的《神道碑铭》皆以杨守陈的《行状》为参考,三者内容颇多重复,且成文时间也甚是接近,均在张楷去世后不久。《宁波府志·张楷传》与《行状》措词有相似之处,然内容更为丰富。《行状》作者杨守陈,宁波人,与张楷为世交,自称“知公为详”[7],其《行状》虽难免溢美之辞,却有较高的可信度。根据上述史料,可知张楷生平如下:

张楷,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三月。天资聪颖,善读书。年十二,能作文。年十四,受地方官举荐,为慈溪县学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年十七,中乡试,成举人。永乐二十二年(1424),中进士,年仅二十六。宣德二年(1427),试政于兵部,以公务诣陕西,有能名,还擢江西道监察御史。五年,因刑部狱中吏受贿放走强盗,张楷弹劾刑部尚书赵玘以下十数人,名声赫然。六年,考绩至行在,因献《圣德颂》,留俟鸿胪寺,正统(1436—1449)初乃还。正统五年(1440),升陕西按察司佥事,理屯田、督租赋、治水利,俱有成绩。不久,迁按察司副使。十二年,再升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当时,京城郊区出现蝗灾,张楷受命督办治蝗,颇有成效。自正统十年起,叶宗留、邓茂七相继领兵起义,张楷奉命监军镇压。为使起义军信服,张楷矫作“征南将军印”,张榜招降叶宗留部成功,起义军因此一蹶不振,直到失败。景泰元年(1450),张楷班师回京,尚书金濂、给事中叶盛、都御史余仕悦等以其矫作将军印、“耽诗玩寇”弹劾之,张楷遂获罪削职,回归故里。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复位,下诏张楷复以金都御史致仕。翌年,张楷赴京谢恩,恰逢陕西用兵,张楷奉命佐师,悉心区画,事毕转南京都察院莅任。四年十一月,张楷“致庆礼于京师,居公邸数日,一疾而逝”,享年62岁。对于张楷的猝然而逝,据说明英宗是“闻讣惊悼良久,特遣官谕祭,复令有司为营葬事”。[8]

张楷一生著述颇丰,《千顷堂书目》所录有:《四经糠秕》、《监国历略》一卷、《平南县志》、《大明律解》十二卷、《律条撮要》(又作《律条疏议》)、《理易》、《稽古正要》、《增广事物纪原》、《武经小学》、《陕西纪行集》、《轻侯集》、《介庵集》、《归田录》、《南台稿》、《百琴操》、《效颦稿》、《和选诗》、《和李谪仙乐府古诗杜少陵七言律》十二卷[9]、《和唐诗正音》二十卷[10]、《和许浑丁卯集》、《和高季迪缶鸣集》、《和中峰和尚梅花百咏》。[11]此外,光绪《慈谿县志》卷47《艺文志二》尚录有张楷以下著述:《春秋糠秕》、《四书糠秕》、《孔子圣迹图赞》三十四卷、《四遗集》、《和草堂诗余》、《蒲东珠玉诗》一卷。[12]

对张楷的评价,持完全肯定意见的以《行状》为代表,《神道碑铭》、《墓志铭》、雷礼(1505—1581)纂辑《国朝列卿纪》、地方志等皆仿之。《行状》称:“公早孤,事母毛氏至孝,为人坦夷阔达,见有寸长片善者,辄播宣而奖引之,视人患难,隐若在己,赴拯之惟恐后,家费裁给,而喜宾客,乐施与,沛若富甚。其学自经史诸子至天文、医卜、小说、释老之书,无不涉猎,文章浩瀚无涯涘。能行草篆隶,尤耽于诗,平生凡百一于诗焉,发之而幼者穷通,夷险缓急,未尝一日或废,常口占走笔,顷刻数百言,群莫能逐,而壮豪赡丽,新意溢出,亦非拘挛琐碎而锻炼者所可及。”又称:“海内之士皆耳熟其名而口腴其诗,朝鲜、日本之使俱市其《和唐音》以归。”[13]

成化三年(1467)八月修成的《明英宗实录》则称“楷为人坦夷,濒老力学犹不倦。性喜吟诗,日不绝口。其征闽浙,亦坐是玩寇,故遭罢斥。李杜诗唐音,悉赅和之。然居官纵弛不检,所至无廉能誉。其复见用,又因贿近幸而得,士论薄之。”[14]汤斌(1627—1687)撰《拟明史稿列传》的说法亦多从之,称:“楷喜吟诗,其征闽也,言官谕其耽诗玩寇,又居官纵弛,无廉介之誉。其再起也,或言因赂曹吉祥得之,故人竞振暴其短,或至过实云。”[15]对深受朝鲜、日本之使喜爱的和诗,钱谦益(1582—1664)《列朝诗集小传·张金都楷》则称“尘容俗状,填塞简牍,捧心学步,祇供啜呷”。[16]陈田(1849—1921)《明诗纪事》称“式之诗于永宣时不落品,惟和唐音、和李杜不自量力,遂貽捧心之诮”。[17]

### 二、张楷与宝德三年遣明使

日本明德三年(1392),足利义满(1358—1408)统一了日本,并以幕府将军的身份主持朝政。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他接受了明朝的册封,积极开展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义满死后,世子义持认为这种关系给日本外交留下了污点,而以公武两方的批判性舆论为背景,采取坚决拒绝同中国建立邦交的行动。日中关系因此一时中断(1411—1432年)。但其弟义教(1394—1441)当上将军后,认为从幕府财政上考虑,对中国贸易的获利不容忽视,因而只能是遵循其父义满的先例恢复邦交。”[18]因此,自永享四年



(1432)至天文十六年(1547)，日本共派遣了十次遣明使。

日本宝德三年(明景泰二年,1451)，足利义政(1436—1490)派遣以东洋允澎(?—1454)为正使的遣明船9艘、共计1000余人入明。至于遣明使的人员构成，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士官、通事各数人，这些人每人还带有从僧、从仆数人。此外，还有驾驶船只的船头、副船头、水手等以及就便搭乘的随从商人。正使、副使由掌管幕府外交贸易事务的醍醐寺三宝院和相国寺荫凉轩主推荐，从天龙、相国、建仁、东福等京都五山僧侣中选拔。居座、士官亦大都从京都五山僧侣中通晓外交事务的人员中选拔。[19]

据《允澎入唐记》[20]，一行人于宝德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辞京，次年正月五日至筑前博多，八月启航赴明，因未等到顺风又返回博多，享德二年(1453)三月，一行人再次出发赴明，五月七日，一号船抵宁波沈家门，二十日达宁波府安远驿，不久，其余八艘船也陆续抵达宁波。八月六日，贡使三百人出发赴京，次年五月三十日返回宁波。关于此次遣明使，《明史·日本传》亦有记载，称其“至临清，掠居民货。有指挥往诘，殴几死。所司请执治，帝恐失远人心，不许。”对其所贡之物，明廷应礼部奏请，减半付值，对此，“使臣不悦，请如旧制。诏增钱万，犹以为少，求增赐物。诏增布帛千五百，终怏怏去。”[21]

虽然遣明使此次入华有颇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们与当地土人的文化交流活动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其中，诸如笑云瑞訢、九渊龙踪、斯立光幢、兰隐馨、后滕居士等人与当时正谪居在家的张楷的交往就颇为频繁，对此，日本史料如《允澎入唐记》、《卧云日伴录拔尤》[22]、《碧山日录》[23]、《竹居清事》[24]、《邻交征书》[25]等皆有记载。现分别介绍如下：

#### 1、笑云瑞訢(生卒年不详)

笑云瑞訢，日本临济宗梦窗派僧。生卒年、俗姓皆不详。嗣法季章周宪。宝德三年(1451)随侍东洋允澎入明。回国后，历任京都等持寺、相国寺、南禅寺住持。《允澎入唐记》的作者。

关于遣明使与张楷接触的最早且最为明确的记载是《允澎入唐记》“享德二年(1453)

六月廿一日”条：“廿一日，陈大人就勤政堂享张楷、按察使、布政司、御史、知府五大人，壁上挂杭西湖图，其绘广五丈许。”

[26]陈大人即《允澎入唐记》中多次出现的“陈内官”，当为主持市舶司工作的市舶太监。其宴请的官员中，布政司周大人和按察使冯大人分别在五月八日和十日自杭州来到宁波[27]，布政使和按察使均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前者掌民政，后者掌刑狱，两人入宁，显然也是为遣明使入贡之事。在陈大人宴请的五人中，唯张楷是与接待来使工作无关的解职在家之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场宴会应当也有笑云瑞訢在场，否则，《允澎入唐记》不会对出席者、现场装饰等细节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景泰四年(1453)九月，遣明使一行抵京。十一月二十五日，应举在京的张楷次子张应麟(字伯厚)，亦特意赴笑云瑞訢处“作诗”。[28]

景泰五年(1454)六月四日，即将归国的遣明使部分成员游完宁波镜清寺后至张楷家拜访，张楷为笑云瑞訢作钱行诗送行。[29]

#### 2、九渊龙踪(?—1474)

九渊龙踪，临济宗黄龙派僧。嗣法名僧天祥一麟。京都欢喜寺住持。宝德三年(1451)，受命作为遣明正使东洋允澎的随员赴明。回国后，历任建仁寺、南禅寺住持。文明六年(1474)三月十一日示寂。有诗文集《葵斋集》，惜已不存。

九渊龙踪来华之前，东福寺宝渚庵庵主云章一庆(1386—1463)曾以偈为之送行，偈曰：“龙翁两国大宗匠，龙子龙孙皆作家。今以扶桑霖雨手，千里外摘杨花。摘杨花，早归去，莫周遮。”九渊来明后，以此偈示张楷，“张楷覩之，拈踏三唱之”，[30]颇为欣赏。九渊并将云章一庆的语录《宝渚和尚语录》请明人题词，结果是“僧录南浦为之序，御史张楷作跋语，西蜀碧峰和尚号休牧翁，赋禅诗五章以称之，其法券名周玄者，作长歌为证也”。《碧山日录》的作者太极藏主在长禄三年(1459)八月二十四日拜访云章一庆时，后者以《语录》示之，果然“咸如先所闻也”。[31]

文正元年(1466)十二月七日，九渊拜访京都相国寺僧瑞溪周凤(1391—1473)时，谈

起入明之事，曰：“张楷作诗曰：‘四千客路皆由海，数十陪臣半是僧。’自揭之座上曰：‘史官当以吾诗为据记日本事也。’”[32]张楷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长禄三年(1459)八月十九日，瑞溪周凤拜见九渊龙踪，九渊“开座上花鸟双屏示之，皆大明诸贤赞也。就中有莺，非此方所谓莺，其形稍大而羽毛全黄也；又有雀，赞之者以为鹁鸪；又有纆干故事，然则雀与鸪一物欤？赞中伯仁、伯远各二首。九渊曰：‘二人皆张楷之子也。’”[33]由此可知，张楷长子张应麟(字伯仁)、三子张应鹏(字伯远)曾与其他明人在花鸟双屏上题赞，并将此双屏送给了九渊龙踪。

#### 3、斯立光幢(?—1474)

斯立光幢，临济宗圣一派僧。嗣法理中光则。宝德三年(1451)，被选随遣明使入明。晚年一度主东福寺，在寺内创宝胜院退居，文明六年(1474)二月七日示寂。

张楷与斯立光幢“对遇甚渥”，并“图师之肖像及题赞语赠焉”[34]，时为景泰五年(1454)六月初一。其赞语保存在《邻交征书》中，曰：

学探正理，教演真詮。玉质温和，水怀湛然。承五师弓冶之托，典列刹锡鐃之权。通文为儒，得道以禅。知之者以为继远东林之遐派，不知者以为出本中葦口传。咦！皆不然。达磨九年无一字，曹溪一宿便能言，正吾立之之谓焉。噫谁詎不然。大明景泰甲戌夏六月吉日，赐甲辰进士、前金都御使张楷赞。○立之谓斯立也，名光幢，东福寺僧，理中法嗣。真书宝胜院藏。[35]

不仅如此，张楷还为斯立光幢所居之斋题匾额曰“哦松”，并“作二诗，又别幅书‘哦松’二篆字以授焉”。据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唐博陵人崔斯立(字立之)学问包容宏深，境界广阔，却颇不得志。其为蓝田县丞时，官署内庭中植有松、竹、老槐，崔斯立常在二松间吟哦诗文。张楷依此典故赠“哦松”匾名与斯立光幢，当是对后者喜作并擅长诗文的鼓励和肯定。斯立对此匾名显然是颇为中意，“归国之后，随处以此为斋扁”。[36]

#### 4、兰隐馨(生卒年不详)

兰隐馨，生平不详。翱之惠风评价其曰：“嗜学善诗。与人话也，未尝以谄虏之事真之齿牙。”[37]宝德三年(1451)十月，被选中随遣明使入华，时为掌管寺院经藏的藏主。

兰隐馨入华后，请张楷为其所携翱之惠风(约1362~1464)[38]著《竹居清事》题词，张楷阅后，称其“立论弘博、文采则丽，读之不能释手”，欣然为其题诗一首，后又觉得仅此“不足以发禅师之蕴”，再次为其题跋，极尽美言之能事。张楷题跋全文如下：

馨公偶带竹居集，添得楼船万丈光。示我犹同剑出匣，看君真是凤鸣冈。

如开宝藏难枚举，似对珍羞必品尝。他日禅林修语录，百年文誉动扶桑。

日本兰隐馨上人携禅师惠风语录，号《竹居清事》至中华，求予印正。余喜其立论弘博、文采则丽，读之不能释手。赋近体五十六字，以题其后，庶表识鉴之不苟云。守黑子书。

惠风禅师语录一帙，其友兰隐上人携至中华，求予印正者。如予既赞以一诗，不足以发禅师之蕴，故后言曰：“觀师之文，盖僧而达于治者也。使其早从吾道，得入官使之列，其弘词奥论，岂不有裨于化理哉。惜乎具大辨才而悉皈于空谛，有大智惠而卒付之觉乘，实斯文之不幸也。然其望之理，即抱之气，则不以地位而有问焉。凤也能以其穷文之心，穷究其师之道。不矜己，不做物，不以智自满，不以学自高。优柔以求之，讽咏以得之。则祖祖相承之业，灯灯相续之焰，将不在师而在谁也？文章云乎哉。遂识如右。守黑子又书。[39]

张楷赞词中称翱之惠风“使其早从吾道，得入官使之列，其弘词奥论，岂不有裨于化理哉。惜乎具大辨才而悉皈于空谛，有大智惠而卒付之觉乘，实斯文之不幸也”。此话决非空穴来风，翱之惠风精通儒学，书稿中处处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中作于嘉吉元



## 5、后滕居士（生卒年不详）

后滕居士，又号晚樵子，生平不详。他入明后，因“未知所以‘寄奴’之为草名”而请教张楷。张楷告之曰：“刘向校书时，老人所吹之物也。”后滕居士“乃知是藜矣，杖有扶人之作，如寄身于奴，故呼藜为寄奴也”。

后滕居士回国之前，张楷为之作饯行诗曰：“扶桑东畔是君家，奉使来乘博望槎。长啸一声归去也，苍波烟树渺天涯。”[40]

## 三、遣明使与张楷交游的原因

由上可知，与张楷一家交往的遣明使成员的身份主要是从僧，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为诗文唱酬、书画题赞、著述赠跋等。如前所述，遣明使成员皆来自京都五山，而日本五山僧侣又多为博洽经史，擅长诗文的“儒僧”，他们来华的目的，除了完成政治上的使命，也渴望实现与当地文人的诗文交流。那么，他们为何会对削职在家的张楷如此感兴趣呢？

首先，张楷有在鸿胪寺任职多年的经历。自宣德六年（1431）“因献《圣德颂》，留俟鸿胪寺”到“正统初（1436）乃还”，[41]张楷曾供职于鸿胪寺五年有余。明代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中略）。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恩，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42]可见，在对外交往中，鸿胪寺主要负责引导朝贡使臣履行朝贡礼仪，“辨其等而教其跪拜仪节”。[43]以日本贡使为例，永乐二年（1404）日使来贡，“帝益嘉之，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偕中官王进赐其王九章冕服及钱钞、锦绮加等”。[44]宝德三年遣明使抵达北京后，也曾“入鸿胪寺习礼亭习朝参礼。”[45]因此，张楷在鸿胪寺任职期间，当有与永享四年（明宣德七年，1432）遣明使接触的机会。而在当年的来使中，有我们前面提及的翱之惠风，据说他与张楷有过交往。[46]我们有理由推测，兰隐馨上人请张楷为《竹居清事》题跋，很可能是受了翱之惠风的委托。事实上，翱之惠风与遣明使中的多人素有交往，在他们入华之前，还为其中多人写过序，如《奉赠九渊禅师游大明国序》、《送兰隐藏司之大明国序》、《钱天與老人入大明国序》、《送文明曦上人游大明国序》、《送通事赵公文端三入大明国序》[47]，因此，遣明使在入华之前，很可能已从翱之惠风处知道了张楷。前述陈内官在招待官员和遣明使的宴会上同时邀请了张楷，恐怕也是因事先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其次，张楷当时虽被解职，可声望仍在，在当地也算威名远扬。《行状》作者、宁波人张守陈对张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后滕居士在回国十二年后对张楷的评说：“御史张楷前为[抗]（杭）州察使，于时贼兵大发而攻[抗]（杭），楷知其泛滥不可御，而给举黄麻曰：‘惟讨贼纶也。’是以士民尽属麾下，力死战，大克振旅。后坐于矫作诏书，而谪宁波府。不啻文学冠乎天下，雄略亦如此矣。有子曰伯曰仁，共有父风。”[48]在后滕居士的眼中，张楷获罪的原因反是其有谋略的表现，这种认识只能来自当地人。可见，张楷被削职并未影响乡人对他的推崇，他们更愿意相信，张楷获罪是有人“忌楷功”。[49]

再次，张楷善诗。虽然，其和诗后来遭到部分人的非议，在当时，却颇受海内外士人的喜爱，所谓“海内之士皆耳熟其名而口腴其诗。朝鲜、日本之使俱市其《和唐音》以归”。[50]日本临济宗圣一派僧季弘大叔（1421-1487）在其日记《蔗轩日录》“文明十八年（1486）七月八日”条中也提到“见子西所投之张式之《饭田稿》，慰病怀者为多”。虽《和唐音》现已不存，可其余著述至少还有34件藏在日本各地，其在日本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遣明使争相请张楷题跋写赞，应当是出自张楷在文坛上的盛名。

最后，张楷“为人潇洒，心地坦夷”，“尤喜宾客，笃于友道”。[51]即使是被削职还乡，依然乐观豁达，与年青的杨守陈“酣觞论文，继日以烛”。[52]这样的性格对身在异乡、渴望求师拜友的遣明使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 四、结语

通过对遣明使与张楷交游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1、遣明使除了完成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使命，还担负着汲取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他们是僧人，同时也是有着精深汉学修养的文化贵族，在汉诗文创作蔚然成风、几不见赴日明僧的五山寺院，他们恐怕一直渴望着有与中国名士直接交流的机会。这就注定了他们在入明后交往的对象不会仅限于僧侣，而是远及一般的文人墨客，而且，在这种交往中，他们显得更为积极主动。这种交流活动对直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以汉诗文创作为核心的日本五山文学的繁荣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2、遣明使常携带师友著述入华，并请中国的高僧硕儒为其撰写序跋。这一方面体现了日本五山僧人对本国汉文学的自信；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华士人的评价对抬高著述的地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张楷为翱之惠风题写的跋语为例，翱之惠风在其《竹居清事》自序中说：“繇覩夫都台张先生楷公，以风流儒雅羽仪中朝，而尚见借绪余极至，颇有意于整齐，所谓女为喜己者容。吁，斯人斯言，吾其頼焉，吾其足矣。有百华衮，吾奚言乎？”[53]张楷的溢美之辞也影响了他人对翱之惠风的评价，《翰林葫芦集》的作者、日本高僧景徐周麟（1440~1518）在《書〈西游集〉後》中说道：“大明前监察御史张式之题其后曰：‘余喜其立论弘博、文采则丽，读之不能释手。’盛哉此言！由是天下人信知倭国有此笔，千歳一人而已矣。”[54]再如，从太极藏主所谓“咸如先所闻也”的感叹中我们也不难知道，明人为《宝渚和尚语录》题词一事在五山禅林中流传甚广。

3、明朝前期，随着沿海边境倭患迭起，日本人在明人眼中的形象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因为日本来使皆为知识渊博的五山僧人，他们与中国文人的交游对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对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展开，能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此外，如前所述，张楷著述至少还有三十四件藏在日本各地，对这些作品，笔者尚未及一一调查，不能判断国内是否也有保存，如果从书籍之路的角度研究张楷著述在日本的流播和影响，是否也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呢？

作者简介：江静，女，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1] 海老根聡郎《寧波の文人と日本人—十五世紀における》、『東京国立博物館紀要』11号、1976年。

[2] 陈小法：《瑞溪周凤与其汉文日记〈卧云日件录拔尤〉》，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七期，国际文化工房，2006年；《〈蔗轩日录〉与明代中日书籍交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

[3]（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7《东观稿·南京右金都御史张公行状》，《四明丛书》第七集（民国四明张氏约园刊本），1940年。

[4]（明）吕原：《吕文懿公全集》卷10《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公墓志铭》，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年。

[5]（明）李贤：《中宪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公神道碑铭》，徐纮编《皇明名臣琬琰录》（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名人类14》），（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6] 嘉靖《宁波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四九五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据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影印本。

[7]《杨文懿公文集》卷13《东观稿·送张伯远贰令怀安序》。

[8]（明）李贤：《中宪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公神道碑铭》。

[9]《明史》卷99《艺文四》（中华书局，1974年）作“《和李杜诗》十二卷”，第2467页。

[10]《明史》卷99《艺文四》作“《和唐音》二十八卷”，《墓志铭》亦作“《和唐音》”。

[11]（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附索引），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12] 光绪《慈谿县志》卷47《艺文志二》，《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36》，上海书店，1993年，第180页。

[13]《杨文懿公文集》卷7《东观稿·南京右金都御史张公行状》，第17-18页。

[14]《明英宗实录》卷321，天顺四年十一月巳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6669页。

[15]（清）汤斌：《拟明史稿列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9》，（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16]（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9》，（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27-128页。

[17]（清）陈田：《明诗纪事》，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1》，（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99页。

[18] 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 [19]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52-554页。
- [20] 笑云瑞訢著。一卷。记述了宝德三年十月以东洋允澎为正使的遣明使进京、享德二年（1453）渡海赴明，三年（1454）回国的全部经过。又称《笑云入明记》、《入唐记》。
- [21] 《明史》卷322《日本传》，第8347页。
- [22] 《卧云日件录》，京都相国寺禅僧瑞溪周凤（1391—1473）的日记，上起文安三年（1446）三月，下迄文明五年（1473），总七十四册。《卧云日件录拔尤》是《卧云日件录》的抄录本，为相国寺僧惟高妙安（1480—1567）永禄五年（1562）的抄本，摘抄内容局限于五山文笔僧的逸事、名尊追忆以及当时禅林的文艺活动等。（参阅陈小花《瑞溪周凤与其汉文日记〈卧云日件录拔尤〉》，《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七期，国际文化工房，2006年）
- [23] 室町时代（1392—1573）中期东福寺僧太极藏主的日记，始于长禄三年（1459）正月，终于应仁二年（1468）十二月，中间有几年记事不全，是研究日本应仁之乱前后社会形势的珍贵史料。
- [24] 临济宗圣一派翱之惠风（约1362~1464）禅师的诗文集。
- [25]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伊藤松编纂的史料集，内容为从魏至清中国人诗文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天保十一年（1840）出版，共六册，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 [26] （日）笑雲瑞訢『允澎入唐記』、『続史籍集覧』第一冊、すみや書房、1970年、第520頁。
- [27] 『允澎入唐記』、第517頁。
- [28] 『允澎入唐記』、第532頁。
- [29] 『允澎入唐記』、第548頁。
- [30] （日）太極藏主『碧山日録』、『改訂 史籍集覧』第二十五冊、すみや書房、1969年、第173-174頁。
- [31] 『碧山日録』、第173-174頁。
- [32] （日）瑞溪周鳳著、惟高妙安抄『卧云日件录拔尤』，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記録』，岩波書店，1992年版、第171頁。
- [33] 『卧云日件录拔尤』、第117頁。
- [34] 佚名『東福寺諸塔頭並十利諸山略伝』，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藏寛正三年（1791）八月謄写本。
- [35] （日）伊藤松『鄰交微書』、国書刊行会、1975年、第408頁。
- [36] （日）瑞溪周鳳『卧云稿』、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藏大正三年（1914）謄写本。
- [37] （日）翱之惠鳳『竹居清事』、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学全集》第三卷、思文閣、1973年、第2808頁。
- [38] 翱之惠凤，美浓人，六岁入东福寺岐阳方秀（1361~1424）门下，后嗣其法。博通宋明理学，以文名称世。永享四年（1432）随遣明使入华，历游江南禅刹而归。有《竹居清事》、《西游集》存世。
- [39] 『竹居清事』、第2847-2848頁。
- [40] 『碧山日録』、第295頁。
- [41] 《中宪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公神道碑铭》，第181页。
- [42] 《明史》卷74《职官三》，第1802页。
- [43] 《明史》卷74《职官三》，第1802页。
- [44] 《明史》卷322《日本传》，第8345页。
- [45] 『允澎入唐記』、第529頁。
- [46] （日）玉村竹二『五山禪僧傳記集成』、思文閣、2003年、第237頁。
- [47] 以上诸文见《五山文学全集》第三卷《竹居清事·序》，第2806-2811页。
- [48] 『碧山日録』、第295頁。
- [49] 嘉靖《宁波府志》卷28《张楷传》，第2240页。
- [50] 《杨文懿公文集》卷7《东观稿·南京右金都御史张公行状》，第18页。
- [51] 《中宪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公神道碑铭》，第184页。
- [52] （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七《东观稿·祭张金都文》，《四明丛书》第七集（民国四明张氏约园刊本），1940年，第18-19页。
- [53] 『竹居清事』、第2791頁。
- [54] 『竹居清事』、第2848頁。